

防范政治风险:新中国70年来的 历程、经验与启示

胡洪彬

(浙江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基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实际,提出了各具特色的政治风险防范策略。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防范政治风险的历史进程可以归纳为4个阶段,其基本经验如下:必须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树立对政治风险的科学视野和理性认知;必须坚持思想建设与制度规范的有机统一;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必须高度重视干部政治素质的锤炼和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世情、国情和党情的深刻改变,党的政治风险又产生了许多新特性,以史为鉴,当前必须进一步形成有关政治风险的评估机制、预警机制、相关主体的责任落实机制、协同参与机制及外交层面的互利共赢机制,以推进新时代党的执政根基和政治领导力实现进一步巩固和提升。

关键词:新中国70年;中国共产党;政治风险;防范经验;前瞻启示

中图分类号:D 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19)04-0031-10

十九大以来,党中央在推进党的政治建设过程中,把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和化解党的政治风险摆在了同等重要位置上。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明确要求各级党组织要积极“把准政治方向”“夯实政治根基”“涵养政治生态”“防范政治风险”“永葆政治本色”和“提高政治能力”,为我们党的发展壮大提供重要保证^[1]。2019年1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就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等命题作出深刻阐释^[2]。在这一系列论述中,有关“防范政治风险”的命题是新时代以来首次论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既抓住了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核心问题,也表明党在对执政安全问题的思考与实践

上实现了纵深化发展。那么,到底该如何认识党的政治风险,抑或如何对党的政治风险进行有效防范和化解,就构成了当前亟待破解的重大问题。要科学破解这一难题,不仅需要不断探索和总结,更要善于在历史经验中找寻答案。

一、新中国70年来党防范 政治风险的历史进程

政党,作为阶级的组织,是一定的阶级或阶层为了共同利益和政治目标而成立的政治组织。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主体,本身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与政治性^[3]。在阶级社会中,各阶级根本利益的不可调和性,决定了政党斗争的不可避免性。

收稿日期:2019-04-05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习近平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思想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深化研究”(19NDJC151YB);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攻关计划项目“新时代新使命下浙江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重构与完善研究”(2018QN024)

作者简介:胡洪彬,法学博士,浙江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研究。

同及阶级内部具体利益的差异,决定了政党取得执政地位后,必然会遭到阶级内外因利益冲突而导致的危机与挑战。所谓政党的政治风险,简言之即政党在执政过程中遇到的危及其统治地位的可能性及各类政治因素的总和。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为推进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作出了不懈努力,同时也开辟和形成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政治风险防范路径。

(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政治风险防范(1949~1956年)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正式成立。随着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党执政的政治风险也接踵而至。尤其是新政府刚刚成立,党的执政根基还不稳定,国内外敌对势力虎视眈眈,试图将新生的人民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党的政治统治面临着极大的危机和挑战。概言之,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改造完成之前,党的政治风险主要来自于两个层面:一是国内反动势力的破坏。建国初期,国民党政府虽移至中国台湾,但全国还未实现完全解放,国内反动残余势力依旧在负隅顽抗。仅1950年初,全国就有土匪武装100万人以上,其中以西南地区最多,达到65.5万多人,中南地区有28.8万多人,此外,华东、西北、华北各有5.9万、4.2万和2万多人^[4]。这些反动势力潜伏于各地并不断积聚,伺机对新政权发动攻击,造成了极大的政治不稳定。二是国际敌对势力的颠覆。新中国的成立也改变了国际政治版图,对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形成了巨大冲击。面对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崛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仅拒绝给予政治承认,而且屡屡发动军事威胁,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导致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极大威胁。

面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给党的政治领导和新生的人民政权带来的巨大冲击,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主要从3个方面展开政治风险防范工作:第一,把做好党内队伍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上。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就要求全党同志在胜利面前要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务必保持谦虚、谨慎、

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以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两个务必”的提出,极大提振了党内继续革命的信心和决心,也为干部政治素质的提升奠定了坚实根基。第二,依靠人民展开大规模的剿匪反特斗争,肃清国内政治安全隐患。从1949年至1953年,人民解放军先后抽调约10个兵团部、41个军部共计约150万人执行剿匪任务,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总计歼灭匪特武装260多万人,缴获各类枪支140余万支^[5]。剿匪反特斗争的胜利既稳定了社会秩序,也进一步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和党的政治根基。第三,推行“一边倒”外交方针,积极寻求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支持。尤其是为有效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对新中国孤立的阴谋,党中央及时作出了向社会主义国家靠拢的政治决策,1950年初,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此外又同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一边倒”外交方针不仅为建国初期恢复发展争取到了大量外援,增强了我国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了解和互信,也为党和国家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党的政治安全也由此得到进一步保障。

(二)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政治风险防范(1956~1978年)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着中国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也由此成为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执政党,党的政治风险也发生转变。这一时期的政治风险主要来自于干部治理和党内作风两个方面:首先,从干部治理角度看,主要表现为特权问题的滋生蔓延。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工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找到了新路。面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好开端,干部群体中争特权的问题亦开始滋生,一些干部“以功臣自居”“贪图享受不愿再过艰苦生活”,一些干部则热衷于“闹地位”“闹名誉”“争待遇”“争级别”,甚至走向“腐化堕落”,这一情形在“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后便有所滋长”^[6],不仅给原本和谐的干群关系造成破坏,也给党的政治领导力提升带来了现实阻滞。其次,从党内作风角度看,主要表现为主

观主义的消极影响。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足够实践经验,党在经济建设上开始出现偏差,5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的恶化及此后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导致党内急躁冒进的主观主义情绪开始在各地蔓延,并最终演变为党内“左”倾错误的开始,不仅导致一些地方个人专断主义盛行,而且破坏了和谐的政治参与氛围及党内政治生态。

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出现的政治风险,党中央并非缺乏判断,事实上在社会主义改造胜利伊始,党就注意到了对政治风险的防范工作,并提出了一系列相关策略:(1)推进党内民主集中制建设。1956年,中共八大顺利召开,这次会议不仅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科学判断,而且进一步提出了党的集体领导理念,并将其作为民主集中制原则载入了党章。这次会议关于党内民主机制和集体领导理念的提出,既有效提升了党在政治决策上的科学性,也为党的领导集体的稳定性提供了坚实保障。(2)着力践行群众路线。1957年,毛泽东同志通过形势分析后指出“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7]。为彻底摆脱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倾向,1961年后毛泽东又重申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并亲自组建调查组奔赴湖南、广东和浙江开展社会调查,摸清基层具体情况,为有效摆脱党内主观主义带来的政治风险提供了现实路径,也进一步巩固了党的执政根基。(3)大规模推进党的作风建设。为进一步清除干部群体中的堕落颓废和官僚倾向,1957年,中央又掀起了以“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和反主观主义”为主题的整风运动,以推进全党同志改进作风,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在整风运动中,各界人士畅所欲言,对改进干群关系具有积极意义,但遗憾的是,运动后期因反右斗争的扩大化而被打乱秩序,运动初始效果受到制约。

(三) 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政治风险与防范(1978~2012年)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改革开放的展

开和推进,提升了党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给党的执政带来了诸多新挑战。从政治建设的角度看,新时期以来党的政治风险主要源自内外两个层面:内部风险,主要来自于腐败问题的现实挑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和国家政治控制的逐步放松,腐败问题这一政治痼疾又开始以各种形式抬头。相关统计数据显示,1980年我国查处腐败案件共计7000余件,至1982年就上升到32602件,此后这一数据呈逐年递增趋势,涉案金额也从改革之初的万元攀至90年代中期的数十亿元之巨^[8]。政治腐败问题的不断裂变,不仅扰乱了来之不易的市场经济秩序,而且也导致党的执政公信力出现流失的危机,政治权威性受到挑战。外部风险,主要来自于政治多极化的消极影响。在深化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际形势也开始朝着多极化趋势不断演变。尤其是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打破了美苏两极阵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由此开始走入低谷。在这一过程中,面对不断崛起的社会主义中国,一些西方敌对势力更是极力展开钳制和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导致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出现和蔓延,给党的执政带来空前严峻的政治考验。

针对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政治风险,党中央给予了高度警觉和重视,并着力从体制和机制上作出回应。一方面,针对腐败问题,党中央高度重视和推进制度反腐工作。早在1982年,邓小平同志就鲜明地指出,坚持对外开放必须“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由此才能确保党和国家的政策“不脱离社会主义方向”^[9](P409-409),在他看来,“不惩治腐败”,就“有失败的危险”^[10](P313)。为确保廉政建设的长期性,邓小平力主推进制度反腐,“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10](P379)。以此为指引,党的十四大强调了建立防范以权谋私的约束机制的重要性,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则进一步强调了反腐败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发展方针。在党中央高度重视下,新时期党和国家的反腐败体制不断趋于完善,腐败蔓延势头在90年代中期后开始趋于下降,党执政的政治根基亦由此得到巩固。另一方面,针对开放状态和政治多极化的消极影响,党中央把坚决抵制各种西方错误思潮摆在了重要位置上。1986

年,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就曾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作出过深刻批判,指出其实质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10](P181),对此决不能听之任之,必须展开批判和抵制。此后,在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的领导下,党中央从政权建设的高度,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进行了持续性批判,在确保党的意识形态安全的过程中,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坚实支撑。

(四) 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政治风险与防范(2012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的到来,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境界,同时也给党的执政和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和新任务。党的十九大明确强调新时代党要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必须“增强驾驭风险本领”,“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11](P55)。系统而言,新时代党的政治风险主要源于3方面:(1)微观上看,源于部分干部政治素质不足的制约。干部是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力量,干部政治素质跟不上,党的执政就会出现危机。近年来,我国各级党政机构高度重视干部能力建设,但在干部能力界定上主要还是以经济绩效为主导标准,对政治素质的界定还缺乏明确性,导致一些地方干部出现政治素质跟不上时代诉求的客观窘境,进而给党执政根基的巩固带来现实阻滞^[12]。(2)中观上看,源于部分党组织政治领导力缺失的挑战。这主要表现在一些地方党组织思想、组织和作风不纯的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在思想上,宗旨观念淡薄、信仰动摇和创新意识不强的问题亟待破解;在组织上,入党动机和党性修养的问题亟待纠正和提升;在作风上,求真务实和调查研究亟须强化^[13]。(3)宏观上看,源于党执政的内外政治环境的考验。国内考验主要表现为党能否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封闭僵化无法彰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改旗易帜则必然导致社会主义性质的改变,二者都会给党的执政带来巨大危机。国际考验则主要表现为党能否适应国际关系深度磨合带来的安全挑战。贸易摩擦、政治打压及舆论抹黑,表明部分西方国家对我国“分化”

“西化”图谋始终未变,如何塑造对我国有利的国际发展环境,依旧任务艰巨且形势紧迫。

对于新时代党执政过程中出现的政治风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主要从以下3个方面展开风险防范工作:首先,在整体层面上,明确提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新命题。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新时代党的建设必须“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确保“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14](P50)。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命题的提出,不仅推动了全面从严治党纵深发展,也有效打击了党内宗派主义、圈子文化和码头文化,为克服党内思想、组织和作风问题提供了出路。其次,在个体层面上,突出强调了培育干部政治素质的新任务。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防范化解党的政治风险,领导干部首先就要担当起应有的政治责任。为此,习近平将着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放在新时代组织工作的首位。在他的重视下,党的十八大以来,相继对《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等法规文件进行修正和制定。其中均对考察干部政治素质作出了明确规定,为化解党的政治风险提供了具体保障。最后,在对外层面上,鲜明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政党所做的一切,是“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贡献^[14]。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既突破了西方国家的国际话语垄断,也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和优越性,因而在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的同时,也极大提升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力,为党的执政带来了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

二、新中国70年来党防范政治风险的基本经验

从1949到2019,新中国成立的70年,也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波澜壮阔的70年,期间党带领人民坚定信念、勇往直前,经受住了一个又一个

政治风险和政治危机的考验,从而在对政治风险的认知、识别和判断上,实现了从“自为”到“自觉”的逐步转变,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事业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亦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70年执政生涯的成功实践,不仅为党巩固执政根基提供了坚实的力量保证,同时也为党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一)在核心起点上,必须把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摆在首位

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类政治风险,首先就要坚持党的根本领导地位不动摇。早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初期,毛泽东同志就曾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15](P303)。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又基于工农商学兵等多个方面,进一步强调了“党是领导一切的”重大命题^[16]。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也明确指出,党的领导地位是决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17](P114)。可见,党的领导构成了防范政治风险的根本前提,而要坚持党的领导,不断提升防范政治风险的能力,则还须不断加强党的领导。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和全面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党以强大的政治动员力来实现政权巩固和推进社会经济发展;到十年动乱期间林彪、“四人帮”的兴风作浪对党的肌体造成巨大破坏;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党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展开拨乱反正,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新中国70年来的历史进程已充分印证了一条内在铁律,即任何时期只要党的执政地位被弱化,党面临的政治风险就大;反之,党的执政地位得到巩固和加强,则党面临的政治风险就小。也正基于此,党的十九大在阐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本方略的过程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因此,要防范和化解政治风险,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是根本前提,这既是内在的逻辑起点,也是核心保障。

(二)在具体识别上,必须结合实际树立对政治风险的科学视野和理性认知

党要切实防范政治风险,重要前提还在于科学认知和识别政治风险。分析70年来党的执政历程,可以总结出以下3条基本经验:(1)为科学识别政治风险,党首先要树立系统性思维。作为国家根本领导主体,党执政根基的巩固既同党的建设休戚相关,也是国家内部各因素共同影响和推进的结果。党的政治风险来源是多层次的,若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政治风险界定为匪特威胁,则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不断成长的阶级斗争苗头就成为当时政治风险的重要来源。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化的不断推进,这一风险又逐渐演化为政治腐败对党的肌体侵蚀。可见,对于政治风险的认知,决不能仅将目光聚焦于党内,更应立足于党对国家的领导以形成系统性认知,如此才能确保万无一失。(2)为科学识别政治风险,党也要树立全球性视野。从建国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孤立,到5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恶化间接导致党内极端冒进主义情绪的产生,再到新时期以来,一些西方敌对势力的政治打压和意识形态渗透,充分表明党的政治风险来源绝不仅限于国内,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科学识别党的政治风险,必须树立全球视野。(3)为科学识别政治风险,党还要树立准确性认识。1957年反右运动的扩大化,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对当时政治风险的过分估计所致,结果不仅运动本身未达到预期目标,反而带来了党内“左”倾错误的蔓延,这表明对于党的政治风险的识别必须做到科学准确,既不能无视也不能过分夸大,应结合党的执政实践和发展环境做出准确评估和判断。

(三)在防范策略上,必须坚持思想建设与制度规范的有机统一

党要有效防范政治风险,必须在客观上科学界定风险,更要在主观上形成警觉性和自觉性。长期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防范政治风险应重在思想先行,这是基本要件。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

命线”^[18]的重要论断,在他看来,“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19](P226)换言之,如果不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则必会在行动中迷失方向,并走向危险境地。在毛泽东同志的高度重视下,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把思想建设摆在首位,为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奠定了理念根基。但历史经验同样表明,思想建设层面如果缺乏制度引导,则其在实践展开中同样有可能走向失控的危机,并给党的执政带来新的政治风险。1957年的整风运动,其目标在于通过思想作风整顿,来克服党内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倾向,其出发点无疑是正确的,但后期走向扩大化和思想“左”倾,则显然同当时社会制度的缺失紧密关联。也即,整风的成功需要党的制度来加以保证^[19]。也正基于此,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对此作出了深刻的反省和总结,并深刻地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9](P333)。可见,党要切实防范政治风险和巩固执政地位,则思想建设和制度构建是缺一不可的,二者必须做到协同配合。

(四)在力量源泉上,必须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

总结7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史,不难发现,无论是社会主义建设还是深化推进改革开放,对人民根本利益的关照和维护,始终是中国共产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前提,也是党每每遭遇政治风险,最终都能化险为夷的内在根源。对此,毛泽东同志曾明确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0](P1031)“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20](P1096)。1957年,在阐释当时的发展形势时,毛泽东同志便形象地将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比作“鱼水关系”;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结合党和国家的发展,更是将人民“拥护不拥护”“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并直言要规避风险,推进改革开放不断成功,就必须“密切地联系群众”,“了解群

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17](P162)。依靠人民群众,就要了解人民群众的意见,支持人民群众的参与。从新中国成立初积极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离开人民的参与都将寸步难行,而新时期的改革之所以能够深化,根本上就源自于对群众首创精神的尊重与维护,也正基于此,党在各个时期的执政根基才能得以巩固,才收获了广泛的人民认同。

(五)在实践展开上,必须高度重视干部政治素质的锤炼和提升

党要防范政治风险,从客体与服务对象的角度看,需要人民的支持和参与,但从领导主体的角度看,则必然离不开各级领导干部政治素质的提升,这是构成政治风险防范的主观基础。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同志就多次告诫党的领导干部要切实做到“又红又专”,这里的“专”即具备专业性的知识,而“红”显然就是要形成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理想信念。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干部政治素质做出了多重界定,如要求干部结合实际系统地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进理论;要求干部要严格执行党的纪律,把切实维护党内团结作为自身言行的根本标准。在毛泽东看来,只要党的干部是“团结的”,则“全党必能团结”,“只要共产党团结,必然无坚不破”^[21]。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亦对干部的政治素质做出了突出强调。面对新时期以来的社会变局,他明确提出了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发展要求,并要求干部切实做到“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这里有关“革命化”及对干部“德”的界定,很大程度上就属于干部政治素质范畴,在邓小平的高度重视下,“讲政治”逐渐成为新时期干部评判的第一标准,并构成了党强化政治领导力的重要手段。也正是基于对历史经验的吸收和借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化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将培养忠诚干净担当高素质干部队伍摆在了突出位置上,明确强调防范化解政治风险,“领导干部要敢于担当、敢于斗争”^[22]。干部的政治素质为党防范政治风险提供了内在支撑。

三、新中国70年来党防范政治风险经验的启示

(一)当前党面临的政治风险的特殊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执政面对的内外环境也发生了较大改变。在这种新情况下,要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实现突破创新,就必须对当前党面临的政治风险的新问题及其特殊性作出科学分析和界定。综合而言,笔者认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第一,从政治风险的内在根源看,更具综合性。党是政治风险的根本防范主体,同时其执政能力状况又构成政治风险的内在决定因素。正所谓“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首先自己就要变得“更加坚强有力”^[1](P49)。就党面临的政治风险的内在根源而言,与改革之前和改革之初相比,党在当前面对的内部政治风险因素要更为多元和综合。从整体层面看,这些因素既涉及到党内制度构建和制度落实的问题,也同党内政治生态和政治文化是否实现净化和具备先进性紧密相关。从个体层面看,则更多地体现为干部因作风和能力问题带来的现实挑战,如一些干部政治风险意识不足,面对不断更新的危机缺乏足够的责任担当和政治能力,以及在执政过程中脱离群众等等,这些问题看似微小,但极易给党的执政带来现实挑战。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突出强调了完善党内法规体系和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重要性,并要求对干部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等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作出深刻认识。

第二,从政治风险的外在原因看,更具复杂性。党的政治风险绝不仅仅源于党内,其很大程度上是国际国内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改革开放之前,由于两极阵营的国际格局,以及国内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舆论氛围,党面对的国际国内风险相对简单。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际格局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和发展,无论是国内国际环境都已发生深刻改变,进而

给党的执政根基巩固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国际环境方面,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交织、贸易摩擦及意识形态冲突,使党的执政面对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国内发展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与此同时,因利益分化而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亦开始显现,如民众在转业安置、征地拆迁及身份待遇等方面,因利益分配欠缺公正而进行的抗争等,这些风险因素看似属于社会层面,但处置过程稍有不慎便极有可能蔓延进政治系统,构成党和国家政治稳定的阻碍因素。

第三,从政治风险的表现形态看,更具隐蔽性。政治风险作为一种引发冲突和危及稳定的可能性,本身就是偶发的和不确定的,亦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在传统政治和社会体制下,相对较为简单的社会政治结构,为执政主体感知政治风险提供了便利,但随着社会政治系统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党在面对更为复杂的体制环境时,其执政面临的政治风险的隐蔽性亦随之强化。以政治腐败为例,在以往体制氛围下,公款消费、行贿受贿等是其主要表现形式,但随着近年来经济发展模式的多元化,腐败形式也在不断出现新的变种,从期权腐败、代理腐败到内幕交易,一些新型腐败往往披着合法合规的外衣干着非法勾当,不仅难以发现亦难以查处,无论是对于人民的根本利益,还是党和国家的政治安全都具有极大威胁性。

第四,从政治风险的消极后果看,更具破坏性。社会政治系统的复杂性,提升了政治风险的隐蔽性和治理难度,同时也在客观上进一步放大了风险的消极后果,并由此带来更大的破坏力。在高度政治化的传统体制下,政治风险产生于政治系统内,很大程度上也在政治体制内得以消解,而在社会转型期内,显然这一局面早已被打破。新旧体制之间的交替与磨合、社会自主性的提升及思想观念的多元化,给政治风险的裂变提供了更加宽松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各级党组织在工作过程中稍有不慎,则看似很小的风险性问题,通过传播和发酵,就极有可能演化成为一个棘手的政治和社会事件,并通过直接性、间接性和涟漪性三大效应给党的执政带来消极影响。其中直接效应即构成

瓦解党的政治根基的直接根源,导致党执政的政治合法性资源出现流失,执政过程难以为继。间接效应即在政治主体缺位的情况下,带来社会经济体系的瓦解和崩溃,民生建设停滞不前。而涟漪效应即指在个体层面上引发更加难以修复的存在性焦虑和信任危机。因此,面对政治风险带来的这些消极后果,党在执政过程中必须给予高度重视,着力实现防患于未然。

(二)70年来党防范政治风险经验的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上强调,当前,我们“既要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由此才能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保障^[2]。当前,党的政治风险表现出来的上述新特征,决定了党要切实做到有效防范和抵御风险,进而实现化险为夷、转危为机,就绝不能仅满足于总结和借鉴经验,更要善于发展和创新经验。对此,通过对新中国70年历程和经验的归纳分析,可为新时代党防范政治风险提供如下几方面启示。

1.新时代党防范政治风险,在本体上要形成具体评估机制

历史经验表明,党要有效防范政治风险,首要前提就是要科学认识政治风险。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把建构具体的风险评估机制摆在突出位置上。风险评估机制,简言之就是对风险事件的过程及影响作出论证评价的制度和体系。长期以来,该机制已在经济发展层面实现了较为成熟的应用,为有效规避经济风险和推动高质量发展带来了积极效果。随着党防范政治风险命题的提出,这一机制亦应深化拓展,实现从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的延伸,为维护党的执政安全和深化党的政治建设提供机制保障。对此相关机制应着力处理好两方面问题:在评估范围上,要以党的执政过程及其影响力为评估核心,形成政治风险的动态研判机制,以实现执政方针、政策制定、执行和落实各环节的全面考量,确保党的执政过程、政策供给同实践诉求与发展环境实现内在契合。在评估

主体上,在坚持党内自评的同时,应适当引入第三方机构如相关智库进行专业性评估,以在提升评估科学性、全面性的基础上,推进各级党组织形成对政治风险的科学认知。

2.新时代党防范政治风险,在操作上要形成科学预警机制

当前,政治风险呈现出来的隐蔽性、复杂性,决定了对政治风险的处理亦须坚持以防为主、防治结合,决不能放松警惕,抱有事后补救的幻想。新时代要切实提升预防工作的精确性和科学性,建构和形成相应的政治风险预警机制不可或缺。如针对地方各级党政机构的执政实践,可以建构三级预警处理系统,其中对于地方政治系统内部产生的严重、紧急事件,且可能对地方执政安全构成直接挑战的,应定为一级预警,事发党政机构要第一时间作出处置并向上级汇报;对于社会层面爆发的矛盾纠纷,并极有可能蔓延至政治层面的因素,要定为二级预警,事发地的相关治理主体要积极展开疏导和化解,力争将问题控制在政治系统外和萌芽状态;而对于涉及人数少、不具备普遍性的苗头性或微小事件,则可定为三级预警,由相关治理主体做好调解和安抚工作。在此过程中,相关治理主体要善于运用最新科技手段,如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等,及时做好对信息的收集和处理工作,为确保上述预警机制有效运作提供数据支撑。

3.新时代党防范政治风险,在主体上要形成责任落实机制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责任与担当“是党的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体现着干部的胸怀、勇气、格调”^[22]。新时代党要防范政治风险,则干部作为政策建构与执行主体,亦须做到强化责任担当,这既是党提升长期执政能力的重要保障,也是中国共产党在70年执政生涯中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当前,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党要以科学化的方针政策,打好风险防范之战,就要进一步形成相应的责任落实机制,为干部明确和落实责任提供保障。具体而言,这一机制应涵盖三方面:(1)在政策建构前,应形成常态的责任明晰机制,其中重点要形成政治风险防范层面的责任清单,促使干部明确责任分工,强化自身政治素

质,为预防风险问题产生提供支撑。(2)在政策执行中,要形成具体的责任监督机制,其中重点在于基于党和国家的法规要求,对干部的政策执行过程展开动态和具体的巡查、监督,确保干部权力运行规范化和政策执行不走偏。(3)在政策失误引发风险问题后,要形成相应的责任追究机制。其中要着力明确政策根源和主体根源,并依法依规作出惩治,确保责任机制的权威性。

4.新时代党防范政治风险,在过程上要形成协同参与机制

党执政过程中政治风险的综合性及其巨大破坏性表明,要切实做到有效防范和科学规避政治风险,就绝不能仅仅依靠各级党组织的一己之力,而应在党政系统内外实现有效协同,通过党政齐抓共管、社会普遍参与来形成防范合力。一方面,在各级党政系统内部,要形成部门间的协同处理机制。面对政治风险的苗头,党组织要引导司法、政协、人大、行政等机构进行协同作战,促使各机构各部门明确自身职责分工,激发联动作战效应,以在通力协作和密切配合中把风险性因素降至最低。另一方面,在政治系统外,要引导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和支持配合。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也是党在应对政治风险中形成的一条重要经验,新时代党应积极加以继承和发展。依靠群众就要虚心接受群众意见,不断满足群众合理合法利益诉求。也即要提升人民群众的正向参与效应,为巩固执政根基提供社会支撑,最根本的是要形成群众利益表达机制,通过搭建通畅透明的利益表达平台,切实满足人民群众的多元利益诉求,从而在形成社会普遍共识的基础上,推进社会政治系统实现整体性和谐与稳定。

5.新时代党防范政治风险,在对外上要推进互利共赢机制

从新中国70年来党的执政历程还可看出,外部环境尤其是国际关系状况,亦构成了党的政治风险的重要变量。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国内政治形势决定着国家对外政策,但国际关系状况反过来亦会对国内政治稳定和发展构成深远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内政与外交是彼此联动、相辅相成的,新时代党要防范政治风险,在着力清除党内、国内

风险因素的同时,也要把积极处理好同其他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关系摆在突出位置上。对此,党和国家不仅要高度重视做好文化的对外传播工作,在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基础上,着力塑造中国发展的正面形象,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传递中国正能量,更要在此基础上着力形成互利共赢机制,积极参与到全球治理进程中去,通过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各国实现合作共赢和优势互补,在求同存异中形成总体稳定和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从而在推进中国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的过程中,为党的稳固执政和国家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四、余 论

切实增强忧患意识,不断强化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能力,是新时代党巩固执政根基和实现长期执政的必然要求,也是深化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2019年初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中,“风险”二字就出现了11次之多,并明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着力增强政治本领,“及时阻断不同领域风险转换通道,防止非公共性风险扩大为公共性风险、非政治性风险演变为政治风险。”^[24]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本身就是在各种风险的洗礼中成长的,也是在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中不断壮大的,这构成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重要因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把握“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24]。当前,唯有在总结历史的基础上,不断提炼历史经验、发展历史经验,才能为党的稳固执政和强化领导权威提供更加坚实的保障。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 为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重要保证[N].光明日报,2018-07-01(01).

- [2] 习近平. 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大局稳定[N]. 人民日报, 2019-01-22(01).
- [3] 王浦劬. 政治学基础[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265.
- [4] 邓礼峰. 建国之初的大剿匪(下)[J]. 瞭望新闻周刊, 1999, (30): 28-30.
- [5] 邓礼峰. 建国初期剿匪斗争概述[J]. 军事历史, 1991, (1): 50-52.
- [6] 潘松文, 高巍翔. 试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员干部利益观教育的经验教训[J]. 黄冈师范学院学报, 2012, (5): 5-7.
-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C].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289.
- [8] 周淑真, 聂平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状况透视和反腐败战略思路的变迁[J]. 探索, 2009, (1): 56-61.
- [9] 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 [10]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11]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 [12] 萧鸣政. 新时代领导干部政治素质及其考评初探[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3): 144-151.
- [13] 王超. 新时代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的政治生态分析[J].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 2018, (4): 101-110.
- [14]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2018. 324.
- [15] 毛泽东文集(第7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 [16] 毛泽东文集(第8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305.
- [17] 邓小平论党的建设[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0.
- [18] 毛泽东文集(第6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449.
- [19] 王明高. 中国共产党整党整风的历史经验及其当代启示[J]. 湖南社会科学, 2002, (4): 130-134.
- [20] 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21] 毛泽东文集(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228.
- [22]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C].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123.
- [23]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N]. 人民日报, 2019-02-28(01).
- [24] 习近平. 立时代之潮头 通古今之变化 发思想之先声[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9-01-04(01).

【责任编辑: 龚紫钰】

History,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CPC's Prevention of Political Risks in the Past 70 Years of New China

HU Hong-bin

(College of Marxism,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Hangzhou, Zhejiang, 310018)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70 years ago,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put forward various strateg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to guard against political risks, providing a guarantee for consolidating governance and promoting development. The CPC's prevention of political risk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an be summarized into four stages. Its basic experience is as follows: we must always uphold and strengthen the CPC's leadership; we must establish a scientific vision and rational cognition of political risks; we must insist on the unity of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institutional norms; we must rely on the support and participation of the people; we must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cultiv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political quality of cadre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a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ith the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environment and within the CPC, the CPC's political risks have many new features. Learning from history, currently we need to go further to form an evaluation mechanism, an early warning mechanism, a responsibility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a collaborative participation mechanism and a mutually beneficial win-win mechanism in diplomatic terms, so as to further consolidate and enhance the ruling foundation and political leadership of the CPC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70 years of New China;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political risk; prevention experience; revelation